



中國

农地产权制度 对农业经济增长的 影响研究

盛济川 施国庆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 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盛济川 施国庆 著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30312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3YJCZH148)

联合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随着对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书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书回顾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实证研究了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农地产权制度在 1952~2007 年的 56 年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用于描述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新兴古典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识别了两类交易效率的改进对于农业分工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最终提出了适应中国农业经济长期增长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可行路径。

本书可供研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学者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盛济川,施国庆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3-039203-9

I. ①中… II. ①盛…②施… III. ①农地制度-土地产权-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321.1②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1357 号

责任编辑:伍宏发 刘婷婷 陈会迎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许 瑞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字数:210 000

定价: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农地产权制度(institutions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是土地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的重要保证。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步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历史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政权更迭和经济发展,几乎都与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产权制度的矛盾或变迁有关。

随着对农地产权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首先,本书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回顾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即私有私用→私有共用→共有共用→共有私用的变迁过程,并对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中国农业经济的随机边界模型分解出的技术效率贡献来衡量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制度在1952~2007年的56年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其次,本书建立了一个用于描述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新兴古典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识别了两类交易效率的改进对于农业分工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比较中国和越南不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证明了该模型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动态化处理,将时间维度和信息问题引入模型,求解了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从而讨论了影响制度试验费用的农地产权制度对社会搜索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有效制度的影响,并使用该模型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之后,本书通过分析现有农地集体产权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了目前在学界主要研究的三种改革方案。最后,从农地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和流动性两方面对不同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并且结合不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对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保障功能这两方面展开分析与研究,最终提出了适应中国农业经济长期增长的农地产权制度选择。

本书在内容组织和撰写方式上力求体现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相统一,在以下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①使用同意一致性理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了评价,通过研究政府和农民的同意一致性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评价;②使用随机边界分析模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定量地测度了农地

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③使用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使用中越两国的实证数据证明了该模型的适用性,同时动态化了农地产权通过制度试验作用于农业分工结构的机制;④针对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瓶颈问题比较突出的现实,本书根据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分析所得出的相关结论,提出了颇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作者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和文献,已尽可能地列于参考文献中,但难免有所遗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真诚地希望专家和读者从不同角度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不断完善和提高。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导论	1
1.1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1
1.2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3
1.2.1 传统要素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	3
1.2.2 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	4
1.2.3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	5
1.2.4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增长	8
1.2.5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9
1.3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11
1.4 本书的研究方法	13
1.5 本书的创新之处	13
第 2 章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15
2.1 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15
2.1.1 制度与产权	15
2.1.2 产权、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	16
2.1.3 制度变迁分析与路径依赖	17
2.1.4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18
2.2 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二：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思想	20
2.2.1 门格尔的制度生成思想	20
2.2.2 哈耶克的规则变迁思想	21
2.2.3 拉赫曼的制度方向点论	22
2.2.4 O'Driscoll 和 Rizzo 的模式协调思想	23
2.3 规范分析的工具：超边际分析方法	24
2.3.1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24
2.3.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特征	26
2.3.3 分工与分工经济	29
2.4 实证分析的工具：随机边界分析	31
2.4.1 随机边界分析的基本模型	31
2.4.2 时间趋势模型	33

2.4.3 带有 α 变量的时间趋势模型	33
2.5 本章小结	34
第3章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	35
3.1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与效率评价方法概述	35
3.1.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概述	35
3.1.2 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效率评价方法	36
3.2 从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到“耕者有其田”的私有私用农地产权制度	37
3.2.1 制度变迁过程	37
3.2.2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39
3.3 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私有共用农地产权制度	41
3.3.1 制度变迁过程	41
3.3.2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43
3.4 合作化运动后期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共有共用农地产权制度	45
3.4.1 制度变迁过程	45
3.4.2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48
3.5 共有私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51
3.5.1 制度变迁过程	51
3.5.2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54
3.6 本章小结	57
第4章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58
4.1 农业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58
4.1.1 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58
4.1.2 农地产权制度与技术效率	61
4.2 随机边界生产函数计量模型的建立	63
4.2.1 随机边界分析模型的类型	63
4.2.2 模型的设定	64
4.3 实证分析	65
4.3.1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65
4.3.2 计量结果	67
4.3.3 计量结果的分析	71
4.4 本章小结	77
第5章 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78
5.1 产权与专业化生产	78
5.1.1 奥地利学派的产权观	78

5.1.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启示	79
5.2 农地产权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的两难	80
5.2.1 基础模型	80
5.2.2 模型的解释	82
5.3 有效率的农地产权制度模糊程度及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83
5.3.1 最优产权模糊程度与最优潜在农地供给者数量	83
5.3.2 区域性市场均衡规模	84
5.3.3 比较静态分析	85
5.3.4 对于模型的补充说明	88
5.4 应用与证据：中国和越南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 比较	91
5.4.1 越南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概述	91
5.4.2 中国和越南在农地产权制度上的比较	93
5.4.3 农地产权制度上的差异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94
5.5 本章小结	97
第6章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及演进机理	98
6.1 制度试验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	98
6.1.1 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思想与制度试验	98
6.1.2 知识在农地产权制度试验中的作用	99
6.2 农民的动态决策和农业分工结构知识的演进	100
6.2.1 农民在初始阶段的动态规划问题	101
6.2.2 农民在初始阶段的最优动态决策	103
6.3 农地产权制度试验与制度变迁的发生	104
6.3.1 农民在各阶段的最优动态决策	104
6.3.2 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	106
6.4 应用与证据：对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解释	108
6.4.1 1949~1952 年的私有私用农地产权制度	108
6.4.2 1953~1955 年的私有共用农地产权制度	109
6.4.3 1956~1978 年的共有共用农地产权制度	110
6.4.4 1978 年以后的共有私用农地产权制度	111
6.5 本章小结	113
第7章 中国农业经济长期增长中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	114
7.1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114
7.1.1 对市场经济的规律的违背	115
7.1.2 导致了畸形的城市化	116

7.1.3 中国人力资本比较优势难以发挥	117
7.1.4 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117
7.1.5 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118
7.2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比较分析	119
7.2.1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案与主张	119
7.2.2 农地产权稳定性视角下的方案比较	121
7.2.3 农地产权流动性视角下的方案比较	121
7.2.4 不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122
7.2.5 不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影响	123
7.3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123
7.3.1 农地产权制度选择的主要依据	123
7.3.2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126
7.3.3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	127
7.4 本章小结	129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130
8.1 本书结论	130
8.2 政策启示	131
8.3 研究展望	133
参考文献	134
附录	145

第 1 章 导 论

1.1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回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走过了一条渐进式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如何实现并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的增长便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门问题。就目前而言,“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矛盾,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贯穿于中国几千年农业经济发展史的始终,构成促进或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成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此,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在“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农地产权制度。

随着农地产权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包括农业生产)的重要性^[1]。Bauer 等认为产权制度等非经济变量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而在中国,一个最显著的证据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主要因素而成为第一位的贡献因素^[3]。因此,农地产权制度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最基本的核心问题之一。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不管这些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如何,也不管这些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动因如何,都给当时中国的农村甚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4]。

而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阻碍农民收入增加的制度性障碍,由此导致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杨小凯认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功能是确定有效率的合约安排而不是分配资源。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发展一个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则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会通过产权的自由贸易而自发地生长出来。而这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会促进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的进步,因而产生经济起飞。”^[5]因此,对于中

国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农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的重要保证。本书所使用的“农地”概念,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1 年发布的《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国土发[2001]255 号)的分类标准,土地可以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以及未利用地等三种一级类别,而本书中的农地是指分类中的农用地,即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由于产权包含有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转让权、收益权、继承权以及其他与财产相关的权利,农地产权制度就是指包含有农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一系列权属和权能的制度安排。

对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urubotn 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对于经济的运行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6]。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制度是一个内生变量,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是通过交易费用反映出来的,交易费用大小是衡量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农地产权制度无疑是最重要、最敏感的“神经中枢”。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农地产权制度成为了整个土地制度的基础。农地产权行为是构筑市场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也是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及配置效率的主要动力。农民的农地外部产权内部化等博弈行为,导致了农地权利演变及制度的变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因此,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农地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目前理论界已有大量的成果问世。由于中国农地产权制度问题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目前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梳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农地产权制度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途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可行性等问题,仍显得扑朔迷离,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深入研究。另外,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农村中自发地出现了许多农地产权制度创新模式,如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创新非常活跃,而对于新经济形式的不断涌现,需要进行理论解释。因而,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减缓、农业经济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仍在不断加大、因征地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杨小凯认为:“各地都有土地私下买卖的活动,政府应该顺应这种自发的发

种私下买卖的案例收集起来逐渐将其变成合法的案例,通过调解纠纷过程,以成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程序或开创司法案例。新的土地私有制就会自发地从案例的积累中形成。这种制度改革方法不会造成大的利益冲突、突然的社会变动,而是用日积月累、渐进的方式改革制度。而这过程中,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秩序的公正性。”^[7]而本书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和规范运作,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归因于投入要素的增加、技术进步和制度。因此,下面将分别从这几方面对这些结论逐一进行讨论。

1.2.1 传统要素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

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传统投入要素,劳动力和土地等的投入差异显然也会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不同。张风波利用中国各省份截面数据分析了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中,劳动力弹性值最大,而土地弹性值最小^[8]。并据此认为,我国农业生产处于较低水平上,农业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而土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冯海发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使用农业物质消耗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投入的替代指标。其研究结论表明,物质消耗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弹性值最大,而土地和劳动力的弹性值相对较小^[9]。朱希刚^[10]和顾焕章^[11]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张元红发现对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现代投入物的增加^[12]。Bloom 等将东亚的“经济奇迹”归功于人口的变化^[13]。

Wang 等的研究指出,1991 年农民的平均利润效率只有 0.62,教育、家庭规模和人均纯收入对于利润效率的解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并与其呈现正相关^[14]。Liu 等研究了 1990 年四川省和江苏省 7000 余名农民的调查数据,他们发现教育水平变量对两省技术效率差异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著的^[15]。罗友发通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三个相应结论:一是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二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是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也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重要作用^[16]。蔡昉^[17]和王德文等^[18]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的改变为包括中国农业在内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即产生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丁戡使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对中国农业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认为改

革以来对农业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现代投入物,相比而言,传统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和土地的作用要小得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19]。Chen 等则使用家庭数据计算了不同区域的农业技术效率。他们发现,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说,人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20]。陈卫平等分析了 1953~2003 年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产出的贡献,其研究结果表明 1953~2003 年中国主要粮食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实现了正向增长,但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以 1979 年为分界点,中国主要粮食产出增长的源泉经历了一场以投入增加为主向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粮食生产力革命。1997 年以来中国主要粮食产出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投入要素的下降^[21]。

赵建欣等从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了 1985 年与 2004 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并检验了两个时期要素产出弹性的差异。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深入,土地与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比例呈下降趋势,而资本的投入比例日益上升。2004 年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劳动次之,土地的产出弹性最小,且与 1985 年相比,资本与土地的产出弹性呈现幅度不等的下降,而劳动的产出弹性则是上升的^[22]。Yu 等发现,由于人力资本与未来的高收入预期密切相关,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农民甚至愿意降低他们的粮食质量以投资于人力资本^[23]。石慧等用方差分解的形式考察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各个因素对农业产出地区差异的贡献,并据此认为 1985 年以来各省份农业产出的差异中贡献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要素投入^[24]。

1.2.2 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

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往往将化肥和农药视为要素投入,而事实上,化肥是一种典型的“土地节约型”(land-saving)技术^[25],是使用化肥来替代土地的投入;与此相对应,农业机械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节约型”(labor-saving)技术^[26],是使用农业机械来代替劳动力的投入。在古代传统农业中,农业生产并不需要化肥和农业机械的使用,这两者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现代科技进步的体现,因此,二者都属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范畴,其投入量的增加应被视为技术的进步,而非传统的要素投入。因而本书中未如以往文献中将化肥和农业机械作为投入要素,而将其视为技术进步。

化肥作为一种土地节约型技术对于绿色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樊胜根指出,1965~1985 年肥料的产出弹性是 0.43,而肥料正是一种土地节约型技术,农业机械正是一种劳动力节约型技术^[27]。而且正是市场需求导致了像中国 F1 号杂交水稻这类的技术创新和推广。Huang 等发现在 1975~1990 年技术变革对水稻产量增加的贡献度占 60%,这其中杂交种子的贡献度占 49%,而复种体制的改变占 11%,Huang 等还发现大多数技术变革发生在 1985 年以后^[28]。Kalirajan、王红伶等都考虑到了技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分别使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方法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量,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及其产生的原因^[29,30]。Fan 等发现从 1965 年到 1993 年间,中国农业增长的 21.7%来源于肥料的投入,电力的投入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为 12.9%,而土地和劳动力的贡献很少。1965~1993 年农业经济增长的 19.5%归因于科学研究^[31]。Mao 等的研究也显示,1984~1993 年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而言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32]。

Xu 指出,1979~1996 年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 47%,而大多数的技术创新发生在 1987 年以后,这其中存在着两个重大变革,即杂交种子的利用和复种体制的改变^[33]。朱希刚测算了技术进步在中国粮食单产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并得出 1979~1997 年技术进步对粮食单产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了 34.9%^[34]。Jin 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发现自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 1990 年之后,为了养活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中国已将大量的资金投入 to 生物技术研究用以提高粮食的产量,中国正逐渐成为除北美之外拥有最高生物技术研发能力的国家。但是随着肥料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显示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35]。而 Chen 等发现,该数值在 1995~1999 年在全国范围内降至 0.22^[20]。Brummer 等根据浙江省 1986~2000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发生在 1990 年以前,在这一时期内技术效率提升得非常快,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可忽略不计,但在这之后,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都变得停滞不前了^[36]。

陈卫平通过运用非参数的 Malmquist 指数法研究了 1990~2003 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其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3 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2.5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 5.48%,而农业效率变化指数反而年均下降 2.78%^[37]。潘鸿对全国 1979~2008 年的数据的研究发现,农业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物质费用的增加和科技进步,并且各省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高低基本上与这些省份的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38]。

1.2.3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

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与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林毅夫在其一系列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农民易于懈怠和高昂的监督成本,计划经济中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没有效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1979~1984 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6.89%^[39];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迅速地实现工业化,中国一方面实行了大力发展重工业政策,另一方面抑制粮食价格以便从农业部门榨取资本积累。而为了使该政策得以实施,中国发展了一种合作性耕作形式——人民公社制度^[40]。“为什么制度会如此不同,为什么会形成某种制度以及如何形成某种制度;这类制度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生产率的差异;为什么有时无效制度会固化下来,以

及如何固化下来;在所有制度差异中,何者真正重要;制度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朝理想的方向变迁。这些问题有趣而富有挑战性。”^[41]因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一方面,制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制度变迁”^[42]。

McMillan 等^[43]以及张峭^[44]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用以研究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但在其研究中只将农地产权制度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后就此不再发生变化。Fan 等的研究表明,在 1978~1984 年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中的 38.6% 来源于制度变革,而该数值在 1985~1993 年变为 42.1%。这意味着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1985~1993 年的制度变革比 1978~1984 年的贡献更大^[31]。姚洋在对中国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分别从地权稳定性、使用权和交易权等三个方面(代表一组完整性的地权)来分析农地产权制度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45]。但该研究只是使用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进行静态分析,而并未考虑地权稳定性、使用权和交易权的变化及其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

作为制度学派杰出代表的张五常提出了佃农理论,他讨论了在不同的土地租佃形式下资源配置的性质,尤其是作为一种土地租佃方式的分成租佃。张五常认为分成租佃制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观点是一种错觉,只要合约安排本身是私有产权的表现形式,不同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的不同效率^[46]。此外,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为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开辟了非常广泛的领域^[47]。胡小平在研究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时考虑到了农地产权制度的影响^[48],但并未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王小鲁^[49,50]和李岳云等^[51]的研究则对此有所改进,他们考虑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序变动,将每年年末转变成家庭承包经营的生产队比例用以衡量农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及其对产出的影响,从而进行了实证研究。孙鹤的研究深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其研究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积极作用分为两种:一是从它开始建立到全国普及所表现出的普及效应;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民劳动热情,即激励效应^[52]。吴方卫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分析,其研究表明总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 32.98%,而这其中有 62.76% 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53]。

Rozelle 等在其研究中从农地产权的所有权、转让权以及自主经营权等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该研究并没有深入地农地产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54]。廖洪乐等分别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以及土地负担等三个方面研究了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负担会对农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土地调整频率的增加会降低土地的产出效率,而土地流转对土地产出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该研究所反映的农地产

权制度的关键变量涵盖了农地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等三个方面的内容^[55]。其对农地产权制度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途径(即地权稳定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社会保障效应等)的研究为今后分析农地产权的内部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法。Ho 认为现有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不仅具有合理性,还得到了政府和广大农民的一致推崇。其研究表明中国虽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土地的权属,这造成了土地权属的相对模糊,即“有意的制度模糊”,但是政府本身也因此受到了约束,而这些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农地集体所有制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功效的原因^[56]。温铁军认为土地私有化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将造成极大的制度成本,虽然现行的混合所有制存在产权残缺的弊端,但为我国国情内生化的产物,是“次优”选择^[57]。

杨国涛等通过使用 Cobb-Douglas 函数分析了各因素对宁夏农业增长的贡献度,其中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达到了 31.68%^[58]。黄少安等运用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 1949~1978 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农地产权制度下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会有较大不同;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农业的产出也有不同^[59]。洪明勇等针对 1949~2004 年贵州省的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制度对贵州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土地制度能够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时,农业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而当农地产权制度不合理时,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大幅度下降^[60]。汪军民使用计量的方法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61]。自 1978 年以来,我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绩效优于 1978 年以前“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农地制度绩效;而 1993 年开始进入第二轮承包后,将土地承包期限延长 30 年所引起的农地制度绩效优于 1979~1993 年承包期限为 15 年的第一轮承包所产生的绩效。这说明权利期限的长短对农地制度绩效有重要影响。黄少安等使用计量、统计和反历史计量的方法,对 1953~1956 年的农业生产效率分四个阶段进行了计量回归,其研究表明:1953~1956 年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有利于激励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利用率,农业稳定而高速增长。而 1957~1962 年的两次农业生产滑坡,从反面说明了取消对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对于农业增长的负面影响^[62]。但上述研究将化肥等土地替代型技术以及农业机械等劳动力替代型技术的贡献视为传统投入要素的贡献,这种方法分析出的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比较简单,但是这种混淆投入要素而得出的相应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同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主观地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分阶段比较各投入要素增长率与同期农业经济的增长率,从

而间接地比较不同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方法无法定量地去衡量农地产权制度的贡献度,且对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划分具有较多的主观成分。

1.2.4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诺思明确提出了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63];诺思又指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64];不久诺思又提出了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给予人们刺激与激励的观点,并且分析了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65]。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还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效果,农业经济增长也不例外。

Doy^[66], Agarwal^[67]和 Meinzen-Dick 等^[68]研究了不同性别的土地产权安排对农业产出效率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虽未进行实证分析,但这毕竟涉及了不同微观主体间在农地产权上的分配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而 Kimberly 等^[69]和 Lynn 等^[70]则分别通过对美国明尼苏达和亚非拉美地区的调查,分析研究了女性在农地利用中的作用。其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大多将务农作为自己的职业,她们在耕作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产出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善于经营较小规模的农地,而且女性的农业产出效率要高于男性。Lilja 等则根据在塞内加尔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估计了农业产出率的性别差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考虑农业生产的投入时间存在分配差异的情况下,女性的农业产出率要低于男性^[71]。虽然上述研究的初衷只是为了分析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但换言之,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户,其特征也反映了农地产权主体间的差别。

姚洋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部分农户特征指标的方法研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该指标的显著性不高,但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农业绩效负相关,而非农就业比例和平均年龄则与农业绩效正相关^[45]。Krusekopf 通过对部分农户的调查资料的研究分析,发现了农地产权安排的地区差异及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研究也表明了人们对于农地产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产权安排领域,产权安排的不同以及产权制度的变迁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72]。李伟在对中国贫困地区的研究中采用农户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的某些特征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户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73]。

张红宇在研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率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一直在遵循着具有更高效率的制度对低效率制度的替代的规律,其变迁的结果表现出正效率的制度绩效^[74]。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使利益相关者都获得了额外的收益,